



各民族文学对生态文学观念的拓展与重构

□杨一丹

在众多民族文学作品中，自然不仅是生命价值的物质载体，更是生命内在精神与意义的生成场域。各民族文学不仅在艺术上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，还在哲学上深化了生态主义的理论边界。

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，生态文学已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。然而，当前生态文学的主流理论体系仍以西方视角为主，侧重于对生态危机的宏观书写与哲学批判，较少关注地方性知识与文化多样性带来的叙事可能。中国民族文学则以其深植地域的叙事传统和对自然的情感性书写，为生态文学提供了重要的补充路径。这些作品扎根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，赋予自然主体性，在地方化经验中呈现出人与自然情感交融、命运相依的微观文学图景。这种独特的生态表达，不仅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框架，展现了自然与人类共生共荣的价值理念，也拓展了生态文学的叙事空间与伦理维度，成为建构多元生态文化的重要资源。

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书写

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文学研究首先要批判的一种思想观念。美国史学家林恩·怀特在《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》中指出，“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”，他认为西方生态危机的根源可以上溯到《圣经》所建构的人类一自然观，“所有造物除了服务于人类之外别无其他目的”。而中国众多民族的创世神话故事，其中就已经蕴藏着人与自然命运与共的价值观念。在藏族史诗《格萨尔王传》中，自然界的山川河流、风雷闪电都被赋予了主体性，甚至成为故事的重要角色。自然并不是为人类服务的工具，而是与人类平等地存在。蒙古族的创世神话中，苍狼和白鹿是成吉思汗家族的祖先，这种叙述强调人类起源与自然界的联系。无独有偶，苗族创世神话中，蝴蝶母亲是万物的起源，而且蝴蝶母亲并非单独偏爱人类，而是公平地创造和对待所有生物，反映了朴素的万物平等、生命共荣的思想。这些神话故事通过将自然元素拟人化、神圣化或直接赋予其创造生命的能力，强调自然万物的生命价值，表达了民族文化中人与自然命运与共的价值观，也为现代社会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有力参照。

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，人与自然的和谐仍是民族文学的主要主题，自然不仅是人类的生存依托，更是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哈尼族作家艾吉的《梯田里的哈批》通过讲述后土司时代的哈尼生活，以“昂玛突”（祭山仪式）等祭祀活动反映了哈尼族将自然视为生命共同体重要成员的意识，强调了人与自然的精神纽带。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歌融汇民族文化与自然景观，他习惯将自然要素人格化，凸显自然界的主体性，展现出浓厚的生态意识和对自然的深情礼赞。藏族作家阿来的《月光下的银匠》用大开大合、不语的坚强和温情成全了小银匠达泽对艺术与信仰的追求，在大自然的恒久面前，小银匠的悲苦

故事最终得到了升华。

在蒙古族文学作品中，草原戈壁意象占据着核心地位。很多作家通过讲述人与自然、历史与文化交织的故事，将草原描绘为蒙古族文化的生命之源。阿尤尔扎纳的《蓝天戈壁》和格日勒其木格·黑鹤的《狼獾河》不约而同地将草原精神化、文化化，以草原的兴衰隐喻人类精神世界的丰盈与匮乏，体现了对自然温情的深深眷恋。对自然意象的极度珍视不仅是对各民族自然崇拜的文学传统的沿袭，更重要的是，自然元素已经内化为他们想象自身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符号，蕴含着少数民族的伦理观和生态智慧。在众多民族文学作品中，自然不仅是生命价值的物质载体，更是生命内在精神与意义的生成场域。

“人学”以外的叙述方式

无论中国还是西方，文学理论的价值指向往往是关注人和人类社会，从人的价值和利益角度思考问题，这有其必然性，也创造了巨大的思想和美学价值。然而，从“人学”的角度来理解文学还远远不够，离开了自然，就无法全面完整地认识人和社会。通过民族文学，恰恰可以发现“人学”以外的价值观念和叙述方式。大自然在这些作品中不仅是背景，更是具有生命力的主体，读者从中能够深刻感受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密性。

佤族作家张伟峰的《空山寂》以佤族村寨的山川草木为叙事主体，呈现了自然丰荣与人类精神世界的内在关联。森林不仅是故事的舞台，更是具有生命力的灵存在。满族作家叶广芩的《老虎大福》建构了一种人与动物的矛盾共生关系，以人们杀死最后一只华南虎后的精神空虚批判了功利自然观。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《父亲鱼游而去》不断在人和动物之间转换身份和叙述视角。仫佬族作家廖润柏（鬼子）的《八月，干渴的荒野》将大地拟人化，讲述了生态的变化与文化的衰退，将大地的声音和人的叙事结合在一起，形成一种独特的生态叙事模式，也为在人的价值之外重构审美价值体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。

生态主义叙事的核心在于，赋予自然以主体性，使其不再只是被动的背景或资源，而是与人类共同构成生活的整体。这种叙事方式突破了传统的“人类中心主义”框架，提醒人们重新认识自然的重要地位。在全球生态危机加剧的背景下，民族文学的这种叙事方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地方化与情感性：人与自然的微观互动

对照西方的生态文学理论，可以发现中国民族

文学在强调地方性知识和情感维度上的独特贡献。西方生态文学理论通常关注气候变化、资源过度开发等全球性生态危机，并以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抽象关系为核心议题。中国民族文学则通过扎根于特定地理环境的地方性叙事，展现了人与自然具体生动并充满情感的互动。这种地方性与全球性的结合，不仅拓展了生态文学的表现范围，也有助于构建更加全面的生态文学理论体系。

中国民族文学常着眼于地方性的微观议题，以具体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符号为依托，通过地方性叙事展现人类在特定生态系统中的生存哲学。这种具体而微的描写，与西方生态文学的全球性宏大叙事形成互补，为生态文学理论提供了更加立体的视角。瑶族作家光盘的《烟雨漫漓江》通过漓江流域居民的生活叙事，展现了河流在广西文化中的重要地位，以漓江边的小人物来展现人类生产活动与河流如何保持和谐。哈萨克族作家朱玛拜的小说集《蓝雪》描绘了游牧文化中人与草场的互动，通过描写生态退化问题，为现代牧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启示，也对全球性的土地退化问题提出了批判性思考。

与西方生态文学注重生态批判不同，中国民族文学更强调人与自然间的情感连接，这种独特的生态视角通过叙事、象征和文化传统得到了多维度的展现。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作品《七叉犄角的公鹿》展现了人与动物之间深刻的共生关系。驯鹿不仅是生产资料，更是精神信仰的载体，体现了鄂温克族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生活哲学。在同样展现鄂温克族生活的迟子建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中，主人公与森林、河流、动物产生强烈的情感互动。这种情感互动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态审美视角，弥补了现代生态文学中常见的抽象化和工具化倾向，为生态文明的构建提供了更加人性化的表达方式。

中国民族文学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生态观念，为生态文学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，不仅在艺术上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，还在哲学上深化了生态主义的理论边界。一是强调自然的主体性，超越“人类中心主义”，为建构多元的生态伦理提供了哲学基础；二是关注地方性知识，通过地方化叙事展现人与自然共生的智慧，为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多样化的实践经验；三是将生态伦理与人类情感深度融合，通过这种情感化叙述，为生态文学注入人文关怀的温度，中国民族文学的生态智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，是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。

（作者系天津中医药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）

■评 论

我无力读完煌煌五十卷的《白庚胜文集》，只能抽出其中一卷《团山文源》谈谈感想，盖因团山也是我的故乡。

故乡是游子心中唱不尽的赞歌。白庚胜青年时期到北京上大学，毕业后留京工作，至今已40余年。乡音虽然大改，不改的是对故乡的魂牵梦萦和一往情深。代序《团山小记》中说：“余之故乡曰团山，因青山怀抱而名之。”“虽居山中，团山却不为崇山峻岭所困，不甘封闭自守。”是故，余爱余乡，凡土地人民、清风白云、风俗习惯无所不爱……”落笔千言，让地灵人杰、多民族水乳交融的团山跃然纸上，引发读者对这个藏于深山人未识的古村落的向往。

白庚胜对故乡的深情厚谊是多维度的。人们可以从《慨当以慷，歌以咏志》中，品味到他对内侄的殷切期望；从《民族文化的诗意图》中，读到他甘为人梯，奖掖后学的高尚情操。他为众多乡友的新作写序，为纳西文化的点滴进步欣喜，不遗余力地加以鼓劲，表现出长者风度。一路走来，白庚胜数十年如一日地艰辛探寻着民族民间文化的踪迹，为纳西文学文化发展发出“新声”。

我从书里还读到他那颗感恩党、国家、时代、生活、人民的心。通读《团山文源》一书，我感到白庚胜在完成对家乡团山的深情回眸的同时，也实现了用开放的视野拥抱祖国，其生命中贯穿着一条鲜明的爱国主义红线。《谈谈纳西族的忠义爱国传统》诠释了纳西族维护国家统一、重视民族团结，忠于党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源所在，充盈着爱国、爱乡、爱民族的大爱。

如果说《丽江文化新亮点》《沙场秋点兵》《我和我的纳西族民间故事》《人间奇迹石头城》《我的学校我的老师》等篇章，更多关注的是丽江或纳西族的文学文化发展状况，那么《域外拾珠东巴异香》《文化遗产保护述话》自序》《共享文明》《和谐文化知行录》后记》《《纳西学研究》发刊词》《郭沫若与纳西文化二三事》等篇幅，则是他推动民族文化发展、攀登思想哲学高峰的结晶。

他认为，“如果说先行者们在五十年前采取主动精神，顺应民族解放的潮流，完成了丽江历史的伟大转变，那么，面对全球化的挑战，我们在新的历史转折时期，更应站在时代的高度，胸怀天下，审时度势，创造历史，重塑辉煌。”他坚信，“纳西人民必将在党的领导下，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祖国的繁荣昌盛、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”。从中足见他对初心和使命的坚守。

《回家的路》写丽江历史上的行路难，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通了铁路、高速公路、机场，天上地上四通八达，北京到丽江不再遥远。作者由此发出感慨：“我会永远铭记路从哪里来、路往哪里去，铭记路由谁开拓、路靠谁维护。这将使我永不迷失所处的方位和前行的方向。”这朴素的语言，道出了他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情。《最后一公里，高架连

□和振华（纳西族）

——评白庚胜随笔集《团山文源》

文化颂歌



心桥》《天雨正流芳》等篇章也表达了类似的情感。

白庚胜的不少作品，奋力谱写了民族团结进步的盛况。《团山文源》除对民族进行礼赞外，也关注其他民族的命运。如《呼吁抢救江边文化》一文中提到：“在民族关系上，工程区自古分布有众多的民族，纳西族、汉族、白族、藏族、彝族、苗族、普米族、傈僳族、傣族曾经在历史上共同开发了这片富饶的土地，并早已凝结成了一个有机的生命共同体。保护江边文化遗产就是保护这些民族的共同利益。这对尊重历史传统、增强民族团结、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与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”可见，他时刻践行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、推动民族团结和发展进步的使命，不忘来时路，如绿叶对根作深情的回报。

该书知识性、史料性、逻辑性强，让人受益匪浅，而文学性、艺术性、哲理性则贯穿全书，弘扬了主旋律，激昂了正能量。《团山文源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纳西族农民的儿子从丽江出发，成长为作家、学者的文化苦旅，也看到了他对党的忠诚、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，看到了他踔厉奋发、回报生养他的故土和培养他的祖国的身影。

（作者系作家）

■关 注

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创意性书写，对时代气息的敏锐捕捉

□赵卫峰（白族）

我意识明显强化。各民族诗人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代言者，他首先是自我存在的思考和表达者。对历史文化传统的关心与自我关怀同等重要。从个人性到多样性，诗人对现实环境及种种情感、生与身的体验过程，其实也是群体精神文化的具体映照。

二

民族及民族文学研究近百年来收获丰富，民族诗歌作为话题仍有较大空间。各民族早期诗歌文化相对属于稳定性传统路径，拥有共识性的认知体系，创作与批评时常也默契于特定的意义表现。当一茬茬诗人逐步置身时代现场，汇入更为复杂的传播环境，难免会与“原地”和“民族性”有所距离而失却辨识度。这种困窘将长期存在，亦是与机遇同在的挑战。而推陈出新始终是文学创作的生命力所在，新、指观念也包括形式与语言的适当翻新，并非河水海水各有千秋，各有风姿的主体性视角与情感可以刷新现实与记忆，为自然与乡土赋予独到的诗艺。

三

从音乐类的歌、说唱类的谣到诗歌联合，再到现代意义和文学性层面的汉语新诗写作，这是一条生生不息的文明链条，是具有非物质属性及活态存在特征的精神传奇，也是各民族诗歌成熟渐进的过程。就《诗选》看，很多作品均呈现出具有现代特征的新经验、新表达，各族优秀诗人正稳步迈向

当代汉语诗歌的高峰。

全球化、数字化、城市化或城乡一体化等各种“化”的现实交错，是所有作家诗人共同面临的背景与环境。近年来，各类语言甚至包括外语在内的多类型写作实践渐多，也给民族文学研究带来新的参考。

汉语作为通用语言，其存在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经过了岁月检验。它是中华文化传播与认同的主干载体，也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合体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时空制约，改善了各民族文化和语言的种种。作为文化实践者的各族诗人当然也是敏锐的感知者和前行者，他们的涌现及其意义在于自觉转型，合流于主流之中，二者在多元交融中互融，推动各民族文学及诗歌文化生态得到互鉴更新，增强民族自信、文化自信。

诗歌传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，汉语言文字保障了其传承与创新的连贯性。汉语或普通话本身也是多元化的聚合，正如《诗经》和《离骚》至今还在传递中国诗歌中的人文精神，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的兼容并包，

促成了诗歌文化在不同时段的生机与辉煌。及至西学东渐，新诗勃发，中国诗歌始终在兼收并蓄、流变融通中开拓，各民族汉语诗歌正如此理。换言之，各民族诗歌传统相对维系了本民族的民族性及历史文化，各民族的汉语诗歌则共同维系着中国诗歌文化传统特性及整体性，二者合力共建了新的历史时期的中国文脉。

在我们这个有着悠久诗歌文化传统的国度，诗歌让“时、地、人”形成了某种精神共同体，让不同时代和地区的诗人相认，其认同共建并促进了汉语文化的丰富与完善。各民族诗人对汉语的创造性运用，拓展了汉语的文化视野及现代化实践，亦对民族文学有创新性充实。

四

现当代民族诗歌经过多个历史阶段，每个时段都体现出不同的审美转型。转型并不意味着截断。时代与社会的进步，促使具有良好教育背景和与网络相伴的写作者在文学界占比甚众，

他们已不再局限于写作的种种既定规范，或者说在写作中，不时体现出对语言才能的自我证明。当代各族诗人的语言方式明显繁杂多维，较多使用包含古典意趣的书面汉语，以及方言、戏剧、俚语的杂糅。杂糅是技能也是力量，是诗歌在数智时代的“跨界”动力与多文化碰撞的结果。相较而言，年轻诗人对各种文化资源的借鉴更为充分，其写作的主体性与语言个性也更为明显。在完成对城乡经验、情感经验、阅读经验的理解与融通之后，“00后”诗人将会达到诗意图与艺术超越的新高度。

《诗选》虽然是管窥式的，但我们仍能从中看出当代民族诗歌表现的多样性、民族文学与汉语言的活态关系。选本的推出既是补缺，也是提醒，提醒写作者在坚持并更新民族性、地方性精神的同时，也要不断与传统对话、与历史对话、与现实环境对话，每一语言个体的自我完善始终是关键，也是构建“语言共同体”的必然要求。

（作者系诗人、《中国少数民族诗选》主编）